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九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韩非子与他的『帝王术』

高专诚

著

三晋著名思想家
韩非子是先秦时代最后一位有创建的思想家,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思想之父。韩非子的思想被专制帝王所用,他本人却惨死在专制帝王之手,这是对韩非子政治思想的肯定,也是对韩非子政治命运的否定。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审:余超英

终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9辑)

韩非子与他的“帝王术”

高专诚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434-00-3

G·50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伟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时势造英雄	(1)
二、求学归刑名	(6)
三、入秦寻功业	(11)
四、身死一场空	(21)
五、上下日百战	(27)
六、君主御群臣	(32)
七、纵横说历史	(36)
八、进退有命运	(40)

引 子

三晋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是先秦时代最后一位有创建的思想家，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思想之父。身处战国纷争的岁月行将结束和秦汉大一统时代就要到来之际，作为思想家的韩非子既是此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总结者，也是此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开拓者。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主要是建立在韩非子政治思想的基础之上的。韩非子的思想被专制帝王所用，他本人却惨死在专制帝王之手，这是对韩非子政治思想的肯定，也是对韩非子政治命运的否定。在如此复杂的矛盾进程中，令人深思之处确实很多很多。

一、时势造英雄

在中国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百家争鸣”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性意义。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来，之所以有“百家争鸣”的开放性的局面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

俗语说的好，“时势造英雄”。在时势所造就的英雄之中，为普通人所熟知的大多是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而在更深层面上影响历史进程的思想家，一般来说，知名度是要差一些的。事实上，用“英雄”来描述这些思想家可能并不十分

恰当,但是,说他们也是时势所造,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晋地区的著名思想家韩非(?~前233)生活在其中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恢宏壮烈的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正处在周王朝的末期。中国历史上有所谓“三代”的说法,说的是,上古的夏、商、周三个王朝,基本上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调。周王朝灭亡商朝而立国,是“三代”的最后一代,所以它有条件总结上两个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得失,设计出一个适应性更强的国家制度,创造出更加灿烂的思想文化。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周王朝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它的成就比上两朝更为惊人。

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以周平王的东迁为标志,周朝被分成两个大的时期,即前一阶段的西周和后一阶段的东周,而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与周朝以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样,周王朝的前一阶段相对来说比较安定,中央政权能够比较好地控制全国的局势。可是,由于周王朝是以分封制立国的,也就是以众多相对独立的诸侯国组成一个大的国家,所以,当历史进入到西周末年时,在内忧外患之下,整个王朝终于分崩离析了。各诸侯国名义上虽然还是周天子的臣下,但实际上却逐渐成了独立王国。这些独立王国,在春秋时期,相对来说有势力的有12个国家,在战国时期则是著名的“战国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

在周王朝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这种由中央集权到诸侯分权的政治转移,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实际上,要想对这一进程的意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阐述,那将是另一部著述的

任务；就本书而言，我们更关心这一意义中的文化含义。

众所周知，20 世纪中叶以前的中国历史，特别是其中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在政治方面，是典型的专制统治。在任何类型的专制政治之下，文化的发展，思想的朝向，是要受到当权者的严格控制的，至少当权者的主观意向是这样的。换句话说，一位思想家，要想获得适度的生存环境，他的思想的言论，必须（至少是在表面上）符合当权者的意志，否则，他的言行就会受到限制，甚至会遭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机缘下，专制政治也有可乘之机，那就是在战乱时期，或者是合法的政权力量顾及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在前一种情形下，各种政治力量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争得明显的控制权和合法地位。所以，一方面，它们无力或无暇去限制思想的言论；另一方面，他们也比较注意自身的形象，纷纷以任用贤才自诩，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会过分严厉地对待各种类型的思想家和他们的言论的。而在战国争雄的时期，当权者的这种不得已的自我控制，表现得尤为典型。

与以后的其他时代相比，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的生存环境要好得多。当然，是有一些思想家死于非命，但那大多不是由于坚持自己的思想，而是由于参与了现实政治的运作，死在政治斗争或政治阴谋之中，比如邓析子、吴起和商鞅等。所以，严格说来，与孔子、老子、墨子、孟子等思想家相比，吴起、商鞅等人主要是政治家。总之，只是坚持自己之思想的真理性，而并不去全身心地投身于实际政治运作的

思想家，在那个时代完全是可以畅所欲言的。而在中国专制政治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情形是难得一见的。而在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形的长期存在，如上文所言，并不是统治者有意表现出了特别的仁慈，而是迫于客观形势，不得不如此。如果一位思想家的言行不足以对当权者的权力地位形成真正的威胁，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想背上嫌弃贤才的恶名。同时，在一个国家无端遭到嫌弃的人才，很可能会不遗余力地服务于与这个国家的敌对的另一个国家。

很显然，在那样的战乱时代，人才的作用尤为至关重要。在各国间你死我活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一个或一批真正的人才，完全可以在短时期内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所以，当孟子指着统治者们的鼻子进行批评时，他们不仅不能生气，还得在表面上表示接受批评；而当庄子尽情地嘲弄楚王派来请他去做官的使者时，楚国君臣上下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看起来，在专制政治之下，思想家的畅所欲言，与其求助于统治者的自觉性，还不如等待着客观形势对统治的压迫。

不过，这样的时代总有它走向完结的时刻。到了战国末期，随着各国实力差距的日渐明朗化，随着大一统的临近，思想家的相对自由的地位开始急剧地由盛转衰。这正好比一出上好的戏剧，它的最高潮的出现，也是它的结尾的开始。用道家的观点来解释，就是所谓的盛极必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事业，使人才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一旦成为这个统一事业中的一分子，就意味着丧失了思想

的自由；因为这一事业成功的力量和奥妙就是极端的政治专制和军事独裁，也就是说，它的成功，是以牺牲个人的独立性，特别是思想上的独立性为代价的。当汉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总结韩非的一生时，最为痛心的是，韩非明知道游说统治者是最难不过的事，但却深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并最终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秦始皇的霸业结束了春秋战国时代思想界最辉煌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这一局面的结束，也有它内在的原因。假如说百家争鸣起始于孔子的时代，那么，到了韩非的时代，这种争鸣已进行了300多年。这并不是一段短暂的时间。300多年间，各家各派学说的异彩纷呈，甚至可以说早已超越了时代所能容纳的思想发展水平。事实上，百家争鸣之后的中国古代2000多年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基本上是对春秋战国时代各家学说的阐释。也就是说，一方面，该说的都有人说过了，能说的也已经说透了，如果再继续说下去，再继续争鸣下去，恐怕只能是言之无物了，所以，应该有人站出来，对这种漫无边际的争鸣提出警告了。另一方面，在这300多年里，各种人物的思想精华也已得到了完全的展现，到了韩非子的时代，应该有个了结了。

所以，韩非子所处的时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韩非子的思想成就应该完全归结于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而是说，以他的思想而论，可谓应运而生，正可以在那样的时代里发挥作用到极致。

二、求学归刑名

纵观韩非子的一生，与对他的思想的了解和运用相比，人们对他的生世的兴趣要少一些，这是许多思想家共同的悲哀。人们大可以不去理会他在世时的苦乐悲欢，却可以尽情地运用和发挥他给世人留下的思想遗产。

有关韩非子身世的记载，比较完整的是西汉学者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散见于《史记》的其他的篇章和秦汉的其他典籍里，但大多是一些评点性的记载，并没有多少系统性的史料价值。

韩非子是三晋国家中韩国王室的后代。虽然不是王位的嫡亲，但是，像他这样的出身，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当中是不多见的。众所周知，在上古时代，文化为贵族所垄断；没有适当的受教育程度，通常不可能从事思想文化活动，更不会有系统的思想，遑论以文字的形式传给后世了。在周朝初年，仍然是学在官府，思想文化活动完全由政府官员掌握着，这些官员无一例外都是世袭的贵族。只是从西周中叶起，由于周天子的失势，周朝廷逐渐失去了对天下政治和文化走向的控制，文化才开始下移，平民人物才有机会参与到社会文化的创造中来。但一般认为，从孔子开始，确切地讲，从孔子弟子开始，才出现了平民出身的思想家。到了战国时代，这种情况就更为普遍，以至于贵族出身的思想家反倒有些新鲜了。所以，来自帝王家族的韩非子的

思想就显出了独树一帜的力量。

出身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人的一生,但对人生的影响也不可轻视。在韩非子的思想中,明显透露出一股贵族气息,这集中表现在对普通人的政治地位的不屑一顾。他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由上而下的,即从在位者的角度俯视臣下和平民。在他的严苛的法制思想背后,被统治者的地位,与国家的最高利益相比,实际上是无足轻重的。当然,那时的思想家都想使自己的主张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为此,在许多思想家的政治思想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利益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在韩非子那里,普通民众是为国家而存在的;而国家就是国君及其左右贵族的国家。所以,在韩非子的思想中,控制普通民众的言论,限制普通民众的行动,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照司马迁的说法,韩非子喜欢“刑名法术”之学,而他的学说本源则是“黄老之学”。也就是说,韩非子的思想,导源于司马迁所谓的黄老之学,最终发展成为刑名法术之学。所谓黄老之学,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思想潮流。据说,齐宣王在齐国的首都临淄建立了一个稷下学宫,目的是广集天下贤士,为齐国出谋划策。在这个学宫里,有一批学者,以老子的学说为基调,打着黄帝思想传世的招牌,主张在位者在施政方面应该清静无为,不要以过分繁琐的法令和过分离饰的教条约束人民,认为君臣如果能为民众作好清静无为的榜样,国家自然就会走上轨道。这样的思想主张是否出自稷下的学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的思想确实影响了一大批后来的学者,包括韩非子。

在韩非子的著作中，就有《解老》和《喻老》两篇文章，至少字面的意思是解释《老子》一书的内涵。不过，韩非子对于老子之学的理解，与所谓稷下黄老学者的原意有所不同。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不是通过在位者的清静无为，而是通过在位者制定严苛的法律来达到天下安宁的。所以，韩非子以黄老为本是虚，而归宗于刑名法术之学才是实。也就是说，韩非子对刑名法术的态度，不仅限于司马迁所说的喜欢，而是十分地景仰，并使自己成为刑名法术之家，也就是通常所学的“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最终把法家思想发展到至极之处。

韩非子之所以要尊崇法家思想，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从时代上来说，法家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学术运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派别。百家争鸣中的各家思想，究其归趣，都是想指导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在韩非子法家之前，儒家、墨家、兵家、纵横家、黄老之学等等，包括道家 and 名家，无论采取积极的态度还是消极的姿态，无不声称自己的学说才是世人生活的唯一可行法则。但是，那毕竟是个战乱频仍、以武为尚的时代，所以，以上各家学说，实际都不可能全面指导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也许其中有个别的派别能够在某一方面起一定的作用，比如兵家之于打仗，纵横家之于外交，儒家之于国家意识形态，但是，要想从总体上使一个国家在短时期内发展壮大，并且能够保持一定的时间，则只要法家才能办得到。

当然，法家思想也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从春秋时代郑国子产铸刑书，到邓析子的竹刑；从晋国铸刑鼎，到魏国李

惶变法运动；从管子时代的齐国法家思想，到春秋战国之际的三晋法家思潮；从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到商鞅在秦国的变法，已经为法家思想的时效性作了充分的证明。而在法家思想的建树方面，除了以上提到的法家人物的思想成就外，还有几位对韩非子的思想产生过直接影响的思想家。

著名的法家思想家申不害，本来是郑国人，后来以其学识为韩昭侯任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在他主政的15年中，据说是国治兵强，没有任何诸侯国胆敢对韩国发动侵略战争。还有著名的儒家大师，赵国人荀子，曾经做过韩非子的老师。荀子的思想，主要倾向是遵从孔子及其弟子子夏的学说，但在许多方面，表述的却是法家的思想。比如他更重视法而不是礼，这既是对于传统的儒家之礼在荀子时代逐渐流于空说的一种反动，也是时代对于法制的呼唤的反应。

法家思想，主要出现和活跃在春秋时代的晋国，以及战国时代三家分晋之后的赵、魏、韩三国。这既与战国时代的三晋国家率先变法有关，也与子夏思想在三晋地区的传播和影响有关。所以，生活在韩国的韩非，加之他又是王室的后裔，对于早期法家思想不可能没有切身的了解和深刻的思索。

从他个人的经历来说，我们说过，韩非子是王室的后裔，对于国家的存亡，与许多来自社会中下层的思想家的感受应该有所不同。虽然我们得不到韩非子作为王室后裔的具体的生活记载，但可以想见，在当时各诸侯国你死我活的拚杀中，王室成员比普通百姓就更多了一份不安定感。所

以,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快速强大起来,或者说如何达到申不害当国时的繁荣和强盛,很可能就是韩非子的夙愿。所以,年轻的韩非毅然投到了荀子的门下。

荀子是三晋人氏,在年轻时代,他的思想深受子夏儒学的影响。成年之后,荀子游历天下,据说曾经在齐国稷下学宫作过首席讲师,在当时的名声之大自不待言。荀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充满了理性的光辉。对于春秋以后的各家学说,除了孔子和子夏儒学外,荀子一概采取批判的态度,这可以使一些年轻好胜的学子们感到欢欣鼓舞。所以,像李斯这样志向远大的青年,也与韩非子一样,来到了荀子门下求学。李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得力干将之一。为了个人的成功,他虽然擅长各种阴谋手段,但由于受到荀子儒学的熏陶,还没有达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所以,在秦国,他最终死在了更残忍的权臣赵高之手。

从本人的生理条件来看,韩非子也许注定不会成为一个当权者或政治家。据记载,韩非子口吃得很厉害,几乎不能言说。然而,在韩非子的时代,能言善辩是从政之所必备。孔子说过,“巧言令色,德之贼也”,意思是说,那种能言巧辩、八面玲珑的行为,是对于优秀德行的贼害。但是,大多数在位者并没有接受这样的告诫,而普通的百姓,就更难于在阴谋家的能言善辩和正直之士的忠厚木讷之间分辨高下是非了。事实上,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擅言语就已经是一种不足了,更不用说这种不擅言语是来自生理上的限制。

韩非子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不得不承认,对于

从政来说,这在当时肯定是一种致命的缺陷。所以他把更多的精力,准确地说,是把其他人用于能言善辩的精力,完全转移和倾注在了实实在在的学术之上,并终于在著书立说方面卓有建树,以至于同样具有极大的好胜之心的李斯,也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比不上韩非。不过,这种自以为不如的承认,并不一定是心悦诚服,而更可能蓄积下由嫉妒而生的难以化解的怨恨。后来李斯之所以一门心意地加害于韩非子,这种同门学习时表现出的明显的高下之分,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三、入秦寻功业

韩非子完成学业的时期,也正是韩国的国势不断被削弱的年代。当时,韩国在位的君主是韩王安。与韩国强盛时期的诸位国君相比,这位韩王安不仅要逊色许多,而且简直就是个庸人。庸人统治下的已经在下坡路上越走越远的国家,真不知道除了亡国之外还会有什么其他选择。当然了,一个国家走向低谷,既不是一朝一夕所致,也不是任何单独的原因造成。韩非子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屡次给韩王安上书,试图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劝谏韩王改革韩国政治,挽救国家危亡。

韩非子的主张是相当明确的,总的来说,就是务实而去虚。在韩非子看来,修法制,御人臣,任贤才,富国强兵,这些都是实;而图虚名,追求儒生的文饰,甚至希望以侠士的壮

举拯救一个国家，这些都是虚。所以，他严厉批评当时韩国的政治倾向是“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就是说，国家所重视的人其实根本派不上用场，而真正能为富国强兵出力的人却不受重用。

韩王安最终成了亡国之君，当然不会有眼光和魄力接受如此的建议和批评。韩非子尽管是王室后代，但他毕竟只是一介书生，并没有为自己撑腰的政治实力，在自己的意见不能为当权者接纳之时，只好埋头于著书立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专制政治下最终的选择之一。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情形下，韩非子写出了他最有名的几篇政论文，包括《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和《说难》等，据说共有十余万言，构成传世的《韩非子》的主体。

东汉著名学者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里记载说，有“《韩子》五十五篇，”而现存的《韩子》也正好是55篇。不过，据学者的研究，这55篇，从篇数上来说，只不过是后人为凑足班固所说的数目而勉强分篇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现存的55篇中，真正是韩非子当时一鼓作气完成的政论文，现在看来是难以下一个确定的结论的。乐观一些说，现存的篇目，大部分可视为韩非所作，其余部分，或是从其他著作中混入的，或为好事者的模仿作品。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韩非子思想成长过程中的作品，与他后来的主流思想有些出入，这也是正常的。

不过，尽管整部《韩非子》严格来说并不十分纯净，但其总的倾向还是比较全面和准确地反映了韩非子的思想，可以作为研究韩非子生平和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当然，不论我

我们今天看到的《韩非子》是否全部是韩非子当时所作，可是，在当时，他的著述马上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韩国，而且还传到了邻国，特别是它的西邻，强大的秦国。此时，统治秦国的正是野心勃勃的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事实上，此时的秦国，在军事上统一中国已成大势。而且，在秦国成长为军事第一强国的过程中，不断地得益于法家思想的指导和法家人物努力。在韩非子之前，有著名的商鞅变法，韩非子的老师荀子也在秦国逗留过。还有，秦始皇得力助手之一，正是韩非子的同学李斯。所以，当秦始皇读了像《孤愤》和《五蠹》这样生气勃勃的政论文时，他的过分的激动是在情理之中的。秦始皇嗟叹道：“如果我能亲眼见到写这些文章的那个人，并且能与他进行一番倾心之谈，就是马上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恨的了！”

就在这时候，韩子的同学李斯已经在秦国站稳了脚跟，成为秦王的重臣。为了满足秦王的这一愿望，李斯马上进言道：“这是一个名叫韩非的人所写。”并介绍了韩非的情况，想必也提到韩非是自己的同窗。李斯之所以这么做，从事件的发展结果来看，显然具有一箭双雕的目的。我们很难说韩非子的才能会在当时的每个诸侯国都能得赏识。事实上，就是他的祖国，对韩非的思想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是，李斯深知，秦始皇与其他的国君不同。一方面，年轻气盛的秦始皇满怀王天下的雄心；另一方面，秦国的国情，正适合韩非政治思想得以施展所要求的政治基础。所以，能把韩非献给秦王，无疑会加深秦王对自己的信任。

李斯并不是秦国，他本是楚国的一个有远大志向的